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

(苏) 达·里·戈林科夫 著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

(下 册)

(苏) 达·里·戈林科夫 著

赵仲元 云 华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Крушение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го

подполья в СССР

Д. Л. Голиков

本书根据苏联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0年第三版译出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

(上、下册)

(苏)达·里·戈林科夫

赵永穆 陈行慧 译
赵仲元 云 华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5印张 574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67·182 定价: (上、下册)2.45元

印数: 00001—40000册

目 录

第一章 白卫匪帮被彻底粉碎

- 第一节 苏维埃领土从白卫分子和占领者手中
获得解放…………… (1)
- 第二节 战争终结阶段的肃反方法…………… (7)
- 第三节 消灭“战术中心”…………… (10)
- 第四节 人民对高尔察克匪首的报复…………… (16)
- 第五节 教会反革命…………… (21)
- 第六节 “合作社工作者”案…………… (32)
- 第七节 对乌克兰政治土匪采取的果断措施…………… (36)
- 第八节 乌克兰肃反人员对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打击…………… (47)
- 第九节 同巴斯马奇匪帮的斗争在继续…………… (57)
- 第十节 谢米列奇耶的反革命组织…………… (62)

第二章 从战争转向和平时期的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

猖獗和破产

- 第一节 国内战争末期的反苏维埃阵营…………… (70)
- 第二节 安东诺夫匪帮被粉碎…………… (77)
- 第三节 叛徒萨波什科夫的叛乱被粉碎…………… (87)
- 第四节 国内东南地区的政治土匪…………… (91)
- 第五节 西西伯利亚的富农叛乱被粉碎…………… (98)
- 第六节 喀琅施塔得叛乱…………… (105)
- 第七节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猖獗和富农暴乱
时期的假革命“左派”…………… (111)

第三章 肃反委员会对国内有组织的反革命的

最后打击

- 第一节 “彼得格勒战斗组织”被破获…………… (117)
- 第二节 饥荒和反革命…………… (124)
- 第三节 “保卫祖国与自由人民同盟”为国际
帝国主义服务…………… (134)
- 第四节 佩特留拉匪帮主力被粉碎，马赫诺匪帮的
覆灭…………… (143)
- 第五节 芬兰白卫分子在卡累利阿的冒险…………… (152)
- 第六节 杜托夫匪帮的末日…………… (156)
- 第七节 翁格恩案…………… (160)

第四章 新经济政策对肃反斗争的影响

-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肃反斗争的特点，国家
政治保卫局的成立…………… (166)
- 第二节 经济反革命…………… (185)
- 第三节 “行动中心”停止行动…………… (194)
- 第四节 巴扎罗夫—涅兹纳莫夫的冒险…………… (201)
- 第五节 中亚匪帮被粉碎…………… (204)
- 第六节 格鲁吉亚“对等主义者”的冒险…………… (211)
- 第七节 吉洪大主教案…………… (218)

第五章 苏维埃国内有组织的反革命残余被消灭

- 第一节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罪行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 (223)
- 第二节 谁是暗杀莫·索·乌里茨基的策划者…………… (238)
- 第三节 佩特留拉的“哥萨克拉达”被消灭…………… (242)
- 第四节 佩特留拉余孽的末日…………… (249)
- 第五节 后悔莫及…………… (260)
- 第六节 匪首安年柯夫是怎样“忏悔”的…………… (264)

第七节	萨文柯夫匪帮的破产.....	(274)
第八节	超级间谍西得尼·雷里的末日.....	(284)
第六章 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有组织的		
反革命地下组织复活企图破灭		
第一节	恢复时期结束时反苏维埃力量的分布.....	(291)
第二节	反苏谎言的炮制者.....	(304)
第三节	反苏的白色恐怖.....	(316)
第四节	沙赫特案件.....	(324)
第五节	富农的恐怖活动.....	(336)
第六节	“阿斯特拉罕案”.....	(359)
第七节	维里·伊布赖莫夫案.....	(365)
结束语		(373)
简明大事记		(377)

第 一 章

白卫匪帮被彻底粉碎

第 一 节

苏维埃领土从白卫分子和 占领者手中获得解放

到一九二〇年初，苏维埃人民已经取得了对于协约国和国内反革命联合势力的决定性胜利。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红军消灭了尤登尼奇将军。革命摇篮彼得格勒受到的威胁消除了。

一九二〇年一月，苏维埃军队在敌后强大的人民起义和游击队打击的配合下，将高尔察克残部消灭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下。三月七日，红军队伍进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分子和外国干涉者已被肃清。

红军解放了俄国北方。协约国军队早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就撤出该地。一九二〇年二月，号称“北方区督军”的米列尔的白卫政权也被消灭了。

与此同时，红军还肃清了乌克兰的邓尼金残匪，三月份又肃清了北高加索的邓尼金残部。

邓尼金这位“南俄武装部队总司令”惊恐万状，死死抓住政权不放。为了免遭灭亡，他号召士兵同苏维埃政权战斗“到底”，答

应给哥萨克“广泛自治”，给“农民和哥萨克劳动者土地”，甚至同意对其政权实行“民主化”。邓尼金根据英国驻在他司令部的使团团团长霍利曼将军的指示，成立了“新的”所谓“南俄政权”。他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发布的宣言里假惺惺地宣告：“南俄政府将竭力利用民主国家制度来贯彻实施各项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以造福于人民，首先造福于劳动农民、哥萨克和工人”。邓尼金任命前“特别会议”主席彼·米·美尔尼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哥萨克活动家彼·姆·阿格耶夫为土地规划与农业部长。他甚至吸收不管部长“社会党人”尼·瓦·柴可夫斯基参加政府。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人民不想拥护邓尼金。所谓“南俄政府”的全部活动只不过是发布上述宣言罢了。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二日，邓尼金便将“俄国武装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男爵彼·尼·弗兰格尔将军，前往国外去了。

在反革命和外国干涉者的军队被粉碎的影响之下，外高加索的革命过程加剧了。四月二十七日，巴库工人起义，反对木沙瓦特的统治，政权转到阿塞拜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手里。四月二十八日，苏维埃军队开进巴库。

一九一九年底，米·瓦·伏龙芝指挥的红军部队对突厥斯坦外里海地区的英军和白军发起进攻。一九二〇年二月六日，他们攻占外国干涉者在外里海的最后一个堡垒克拉斯诺沃茨克。

关于英国在外里海地区的最后占领情况，我们早就熟悉的督政府委员季明写道：“英军指挥部没有一天不提出种种新的要求。马利逊将军和狄克-琼斯舰长先是幕后策划阴谋诡计，采取神秘莫测的就连‘政府最高人士’也不总是理解的措施，后来索性对督政府委员的良心和尊严公开施加压力。事情竟然发展到这样地步……德鲁日金到我这来，以伦敦政府最高代表的名义向我提出：鉴于英军即将撤离外里海地区，让我陪同他和督政府委员别洛夫途经波斯和印度前往伦敦，而马利逊将军作为对我们三人在

危机时刻为英国政府效劳的报酬，保证付给我们五百万金卢布。当时我只能回答说……我拒绝这个建议，因为我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而且感到我脖子上的精神绞索已拉得越来越紧。”

一九二〇年初，同安年柯夫和巴基奇匪帮作战的谢米列奇耶战线也撤销了。他们的残部都逃往中国境内。

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协约国武装干涉军中日益深入人心。协约国政府不得不从苏维埃国家召回自己的士兵。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停止援助各反苏维埃“政府”。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协约国最高会议准许同苏维埃俄国交换货物，从而实际上结束了对俄国的封锁。

由于在内战各条战线上打败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米列尔和外国干涉军，苏维埃国家终于得到了和平的喘息时机。苏维埃人民满怀创造激情开始了和平的工作，着手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

但是，国际帝国主义再一次出来妨碍安排苏维埃人民的和平生活。

从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〇年四月，苏维埃政府多次向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提出和平倡议。除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同苏维埃政府签订和约的爱沙尼亚以外，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都对这些建议不予响应。协约国政府宣布撤销对苏维埃国家的封锁之后，继续干涉它的内政。它们只是改变了干涉的方法，现在宁愿假借俄国反革命分子和“缓冲国”人民之手来作战。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则用武器和所有其他战争手段供应盘据在克里木的邓尼金余孽——弗兰格尔男爵，它们运用同样办法支援波兰的皮尔苏茨基，唆使波兰同苏维埃国家打仗。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波兰军队开始进攻。同它一起踏上乌克兰土地的还有它的“同盟者”佩特留拉分子。五月六日，敌

人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白俄罗斯，他们占领明斯克。六月六日，弗兰格尔的军队也转入进攻。苏维埃国家再次陷入战争深渊。波兰侦查机关代理人 and 反革命地下组织的间谍破坏活动大肆活跃起来。苏维埃后方，焚烧军事仓库、炸毁桥梁和匪股袭击事件愈益频繁。五月九日，莫斯科一座炮弹仓库被炸毁。一个月当中，敌特破坏分子就摧毁近 20 个军事目标。破坏活动的规模尤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最大。苏维埃政府被迫再次使国家转上战时状态。

但是，正如邓尼金入侵时一样，人民群众其中包括劳动农民，都憎恨新的入侵者。波兰地主和糖厂主尾随波兰军队之后相继回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算恢复他们的庄园和工厂。而跟在弗兰格尔匪徒之后，正象先前尾随邓尼金匪徒后面一样，滚滚而来的还是那些俄国“地主的两轮单马车”。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弗兰格尔政府颁布“土地法令”，规定“强制土地占有者让出大量田产”。然而，法令说“土地不是白白让予，而是由国家支付地价”。采取这种办法转让土地，其目的是为了土地转到“真正可靠的主人手里，而不是转到任何贪图馈赠并同土地毫不相干的人手中”。可见，“法令”虽然在词句上写着“强制让出”，但它所隐藏的真正目的，却是损害过去二十五年中每年必须向地主交纳五分之一收获量的农民，用以满足前地主的要求。

就连富裕中农也不满意这个法令。在农村，弗兰格尔分子安插的各种官吏(狱吏、警官、乡长)以及地富的食客贪污受贿，酗酒成风。农民不相信弗兰格尔政权会持久。白军中大批开小差和逃避执勤。弗兰格尔分子占领的克里木和其他地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部队官长不经审讯就将有同情布尔什维克嫌疑的人绞死。

被占领区的劳动居民对于波兰贵族同样采取敌视态度。波兰

企图吞并历来属于俄国的土地，因此对波战争的性质也就激起了爱国主义的高潮。列宁说：“对波战争甚至也激起了那些完全非无产阶级的、丝毫不同情共产主义的、不是无条件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时应当说是根本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爱国感……”^① 苏维埃政府吸收一切愿意对波作战保卫祖国的人参军。为此，一九二〇年五月二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总司令下设立“特别会议”，参加会议工作的有老的著名将领阿·阿·勃鲁西洛夫(会议主席)、阿·米·扎伊昂奇科夫斯基等人。

那时的局势对于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所作所为也有影响。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批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号召该党党员起来反对弗兰格尔反革命势力和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进攻。伊·扎·施泰因贝尔格代表这一批人请求俄共(布)中央准许他们公开活动。这一请求得到了满足，遂于一九二〇年十月成立由伊·扎·施泰因贝尔格、雅·米·费什曼、伊·尤·博卡拉、斯·费·雷勃金和奥·列·契日柯夫组成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组织局，提出大力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反对武装反革命的口号。该局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全体党员积极参加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而“勿将自己的工作变为从事党派斗争的纯政治性职业”。

小资产阶级政党中的革命分子，甚至整个党组织(“最高纲领主义者联合会”于一九二〇年四月，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派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崩得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革命共产党人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以及某些乌克兰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无政府主义者”)纷纷加入了共产党。

毫无疑问，小资产阶级政党政策上的这种转变，对于苏维埃国家的生活起了有益的作用。全俄肃反委员会机关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采取灵活方针，不止一次地释放这些党被捕的党员，只要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2页。

他们具结保证今后不用罪恶方法反对苏维埃政权。例如，一九二〇年六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释放三十四名保证以后不再进行反苏维埃活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

对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沃尔斯基)派成员，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通过决议：“作为一项指示执行，即社会革命党少数派成员不得逮捕”。其中被地方机关无端逮捕者，也都由全俄肃反委员会予以释放。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乌法省肃反委员会逮捕一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委员向列宁提出申诉。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会成员斯·格·乌拉洛夫参与检查这次逮捕是否有根据，结果，原为“人民派”的十名被捕者均获释。

然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往往会滑到反革命方面去。甚至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组织局的成员，尽管在行动上站在苏维埃立场上，也不总是能够坚持到底。如果说其中某些人(例如，加入共产党的雅·米·费什曼)不断向布尔什维克靠拢，那么另一些人(例如，那个伊·扎·施泰因贝尔格)后来终于滚入反革命的泥潭。

经过人民的英勇努力，扭转了对波兰和弗兰格尔的战争进程，使之发生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变化。当时，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慑于红军节节胜利，才同意波兰和苏维埃俄国停战。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首领们在战争中确信，他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掠夺性目的。十月十二日，以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为一方，以波兰为另一方，在里加签定了关于停战与暂定和约条件的条约。十月二十三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这一条约。现在可以把一切力量都用于对付弗兰格尔了。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南方战线在米·瓦·伏龙芝指挥下转入坚决进攻，十一月十六日进攻结束，彻底消灭弗兰格尔，解放克里木。这已经是国内战争的最后胜利，白匪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被坚决彻底粉碎。

第 二 节

战争终结阶段的肃反方法

内战前线的局势刚一好转，苏维埃政府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就重新研究了肃反方法问题。

一九二〇年一月，费·埃·捷尔任斯基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下述建议：以全俄肃反委员会名义，指示地方各级肃反委员会机关自二月一日起停止采用极刑(枪决)，并将有可能定为此种刑罚的案件移交给革命法庭。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采纳这项建议，“使停止采用枪决的这项命令也同样适用于全俄肃反委员会”。选出委员会“起草正式命令，并代表整个政府确认这一命令”。

全俄肃反委员会颁布的命令指出，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粉碎，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收复，为肃反斗争创造了新的条件，并使形形色色反革命集团妄图通过阴谋、叛乱和恐怖活动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希望彻底破灭。现在，已经可以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放弃使用极刑——枪决，而“将恐怖武器放在一边”了。出于这些考虑，全俄肃反委员会决定在其所属机关的判决中立即停止采用枪决，并建议人民委员会在革命法庭的判决中也取消极刑。与此同时，全俄肃反委员会也警告说，如果协约国恢复对我国的直接侵犯，“必然会提出恢复恐怖方法”的问题。全俄肃反委员会提醒各级肃反委员会要更加重视反对投机倒把和渎职罪的斗争，协助整顿经济生活，清除怠工和无纪律性所造成的种种障碍。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级地方机关的判决和革命法庭（军事法庭除外）的判决中，一律废除极刑（枪决）。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这一决议。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做的报告中说：

“协约国的恐怖主义迫使我们实行了恐怖。因为称霸世界的大国不择手段，用大批军队压到我们头上。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做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所强加于我们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因而我认为，并且也希望和相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定会一致批准人民委员会的这一措施，规定在俄国不准采用死刑。不言而喻，如果协约国企图重新采用战争方式，那我们也会不得不重新实行旧日的恐怖……”

在省肃反委员会第六次代表会议（一九二〇年二月三——六日）上，费·埃·捷尔任斯基提出改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并号召“探索这样一种方法，使用它我们无需进行大规模搜查，不必利用恐怖，但能时刻监视敌人，根除他们的阴谋和暗算。”列宁在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提醒肃反人员注意“……同反革命势力、同隐蔽的和公开的白卫武装力量激烈斗争的第一个时期，看来就要结束了。但是，更可能的是，这样或那样的反革命活动和暴乱的尝试将会不断发生……”。列宁号召肃反人员保持充分的战斗准备，随时击退敌人。他说：“在保持这种战斗准备，不削弱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机关的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到从战争到和平的新的过渡，略加改变策略，改变镇压的性质”。①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颁布的《关于革命法庭》的新条例里载

① 《列宁文稿》，第3卷，第202—204页。

明，革命法庭是拥有判决权的唯一机关（甚至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也如此）。新条例第1条注释中只规定下述一种情况例外：“为了反对破坏劳动纪律者、维护革命秩序和反对居民中的寄生分子，如侦查所得材料不足以按刑事诉讼程序移送其案件时，全俄肃反委员会和省肃反委员会（经全俄肃反委员会批准）有权将上述人员拘留在劳动改造营，拘留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48号命令，就这一例外情况对各地肃反委员会做了说明。所以需要说明，是因为对付资产阶级和罪恶世界反对劳动人民的斗争办法尚未纳入轨道，还未做到每件罪行只能由法院来惩办。因此，法律仍然赋予全俄肃反委员会以行政方式对那些有反革命嫌疑的反社会分子和人士实行隔离的权利。可以用这种方式拘留的有：过去的地主、资本家、沙皇官吏、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党成员、有投机倒把嫌疑或被揭发同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者、为反革命分子保管来往信件或金钱者，以及破坏劳动纪律或对共和国经济生活实行怠工者。

在同波兰白军和弗兰格尔作战期间，苏维埃国家加强了同地下反革命的斗争。国家安全机关，尤其是军队中的特别科得到加强，党对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也予加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予某些省的革命法庭以军事法庭的权利。鉴于波兰白军特务在红军后方加紧活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于五月二十八日颁布法令，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戒严”。为了对这一法令的执行情况和对共和国的敌人采取措施无情镇压一事进行总的监督，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专门委员会（瓦·亚·阿瓦涅索夫任主席，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斯·阿·梅辛为委员）。对于一切旨在反对共和国军事安全的罪行，诸如爆炸、纵火、叛变、从事间谍活动、倒卖军用物资、保卫军事仓库和其他军事目标时玩忽职守等，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赋予特殊全权的机

关都被授予革命军事法庭的权利。

在乌克兰，对于反革命采取了特殊镇压措施，因为在那里波兰特务的敌对活动同佩特留拉匪帮的敌对活动汇合在一起，在那里弗兰格尔的地下组织也大肆活跃起来。

革命保卫机关始终遵循无产阶级的阶级原则。将下面两种态度结合起来：一方面无情镇压，对资产阶级、地主、手持武器的凶恶白匪、特务和叛徒采取严厉措施，另一方面对那些一时偶然站到反革命方面的人们慎重对待。全俄肃反委员会著名活动家马·扬·拉齐斯指出，无产阶级并不惩办落入敌网的工农，仅仅是孤立他们，“当他们还没有觉悟，还没有睁开眼睛，当我们面临的危险时刻（这种时刻已经多次出现）尚未过去。但是，无产阶级对于那些自觉自愿的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却毫不怜悯。它搜捕和打击那些反革命头目……”

在逮捕和判决时，在专门对那些被蒙骗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工农单独特赦时，也采取阶级的态度。

第 三 节

消灭“战术中心”

一九一九年审讯反革命地下组织案件时揭露出，在苏维埃国家内部，有指导反苏运动的政治联合组织即政治中心在活动。可是，这些中心一直没有破获和消灭。

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米列尔失败以后，苏维埃国家后方的反革命已在土崩瓦解。一九二〇年二月，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一批阴谋分子，其中包括燃料总局管理局务委员会委员

尼·尼·维诺格拉茨基和谢·安·科特利亚烈夫斯基教授，他们原来都是地下中心领导机关的成员。维诺格拉茨基和科特利亚烈夫斯基以及随后其他被捕人员，经过切身体验确信反对苏维埃政权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他们向人民认罪，坦白交待。这样，才揭露出反革命组织的领导骨干，破获先前并不知道的、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间指导国内反苏运动的地下“战术中心”。

在苏维埃审判史上，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被告对其反革命活动表示忏悔的声音。被告之一、原《逝去的声音》总编谢·彼·美尔古诺夫，后来在侨民刊物上是这样解释被告们为何坦白交待的。他写道：“所有即将到庭受审的人，在预审时不仅对自己的事，而且对他人的事也都无法坚持沉默不语的策略了……初次讯问以后，我就沉思，在审讯时我该怎么办……实际上，事情确实是十足的历史性的：不得不对过去的而在目前已无补于实际的事负责了。预审员早已知道我能向他提供的一切事实。因此，如果在原则上采取默不作答的态度，看来我只能毫无必要地加重自己的厄运，而且或许也会加重那些在我看来并不打算矢口否认的人们的厄运。”这就是美尔古诺夫所写的他坦白交待的原因。

被告的交待帮助揭发出自十月革命起就开始在苏维埃国内活动的反苏政治团体和联合组织（“社会知名人士联合会”、“工商委员会”、“土地私有主联合会”、“右翼中心”、“民族中心”、“俄国复兴会”）及其领导骨干。

一九一八年底至一九一九年初的冬季，各种反苏集团人士，在著名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原“经济学家”叶·德·库斯柯娃的家里举行“茶话会”。他们讨论了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竭力制定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政治纲领。“战术中心”就是在这一伙人中产生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起诉书说：“一九一九年二月开始的事件促使莫斯科的反革命分子最后纠集在一起。对此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首先是协约国广播说预计要在太子群岛召开代表会议一事。这